



#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曹 峻 (上海大学文学院)

马桥文化是位于太湖地区的一支夏商时期文化。上世纪 60、90 年代曾对马桥遗址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物。这其中,一批发达的泥质红褐陶罐、盆、鸭形壶等器具格外引人注目。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们认识到这批器具的制法、纹饰、器形等可溯源至浙南闽北地区的江山肩头弄类型文化,且认为正是夏商时期以泥质红褐陶为代表的肩头弄类型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而成为马桥文化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然而,尽管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与肩头弄类型同类器的关系显而易见,但是究竟红褐陶的哪些部分与肩头弄类型密切相关?二者的密切程度具体又是如何?这些带印纹的红褐陶究竟说明了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的什么关系?它们在马桥文化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扮演着什么角色?本文即试着就这些问题也来谈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

## 一、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辨析

根据发掘报告,马桥文化出土的陶器分为夹砂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泥质红褐陶四系。其中泥质红褐陶系因其器表绝大多数饰印纹,因此常通称为印纹陶,或将马桥文化的红褐陶以“红褐陶(印纹陶)”的形式表达二者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从胎质来看,尽管泥质红褐陶内部有颜色从橘红到紫褐、硬度从软到硬的变化,但这些变化被看作是一种渐变而将泥质红褐陶统归为一系。但是,如果认真观察马桥文化的出土陶器,则会发现泥质红褐陶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

首先,马桥文化红褐陶与印纹陶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从上世纪 90 年代马桥遗址发掘报告所发表的完整器形来看,饰有印纹的泥质红褐陶似乎还不够“绝大多数”,而只能是“大多数”。据初步统计,在 68 件完整泥质红褐陶器中,素面或仅

施弦纹的陶器为 26 件、施有几何印纹的陶器为 42 件,二者比例约为 2:3(表一),可见红褐陶中除

表一 泥质红褐陶纹饰统计表

	施有几何印纹	无几何印纹	小计
甗	1	0	1
大罐	16	0	16
小罐	4	1	5
中盆	0	1	1
小盆	8	7	15
钵	2	0	2
豆	0	1	1
盘	0	1	1
三足盘	0	2	2
杯	0	1	1
鸭形壶	10	0	10
盂	0	1	1
器盖	0	1	1
纺轮	1	4	5
拍	0	6	6
总计	42	26	68

注:纺轮有 4 件标本未发表,此处计入 2 件未施纹饰泥质红陶;陶拍有 1 件未说明陶质,本表计为泥质红陶、未施纹饰。

了大部分施有印纹之外,尚有相当一部分陶器未施加印纹。另一方面,马桥文化中施印纹的陶器也并非仅有泥质红褐陶一系。除了泥质红褐陶之外,大量泥质灰陶系的觶、觚、大盆、簋、豆、三足盘等酒器和盛食器表都印有各类云雷纹和席纹、叶脉纹等纹样,还有一部分夹砂陶系的鼎、甗、釜等炊器亦装饰方格纹、条格纹、叶脉纹等典型几何印纹。这其中,灰陶觶、觚等器的云雷纹多为戳印或压印而形成的带状装饰,可能与二里头文化有更多的相关性,而夹砂陶系炊器上的方格纹、席纹、条纹、叶脉纹则为成片拍印的纹饰,其文化特征与属性应与泥质红褐印纹陶一致。因此,泥质红褐陶中既有未施加印纹

的、亦有施印纹的陶器,而印纹陶不仅包含了泥质红褐陶,同时也包含了一部分泥质灰陶和夹砂陶。就泥质红褐陶来说,其实际上包含了未施印纹和施有印纹两类陶器。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前者称为“泥质红陶”、后者称为“泥质红褐印纹陶”。

其次,从陶胎的质地方面来看,泥质红褐陶系可分为软陶和硬陶两种类型。目前研究表明,软陶和硬陶的区别除了颜色、硬度上存在逐渐变化的现象之外,在化学组成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硬陶中氧化硅的含量一般高于软陶,而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则低于软陶。尽管马桥文化陶工在烧造这些不同质地的陶器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泥质红褐陶软陶和硬陶之间化学组成的差别还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陶工对陶器胎土已经开始区别对待。

再次,从器物造型来看,泥质红陶、特别是泥质软红陶与泥质红褐印纹陶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小的差别。仔细观察,红褐印纹陶器的形态相对泥质红陶而言更加丰富和多样。就罐和盆这两类泥质红陶与红褐印纹陶共有的主要器形来说,泥质红陶器的形态多表现为斜折沿、圆鼓腹或斜弧腹、平凹底,而红褐印纹陶器的口沿部有斜折沿、平折沿、高领等不同形态的变化,腹部表现为圆鼓腹、垂鼓腹、斜直腹、直腹等多种式样,底部则多为平底、平凹底和圈底。总体来看,泥质红陶数量相对较小、器物造型较简单,红褐印纹陶数量相对较大、器物造型也较多变化。追溯二者的文化渊源,相对单纯的泥质红陶其斜折沿、圆鼓腹的特点,可在崧泽、良渚文化中找到相似因素,应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有关(图一);而泥质红褐印纹陶丰富多样的纹饰和造型特征在本地找不到文化渊源,更多的应该与外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或者是马桥文化自身新创的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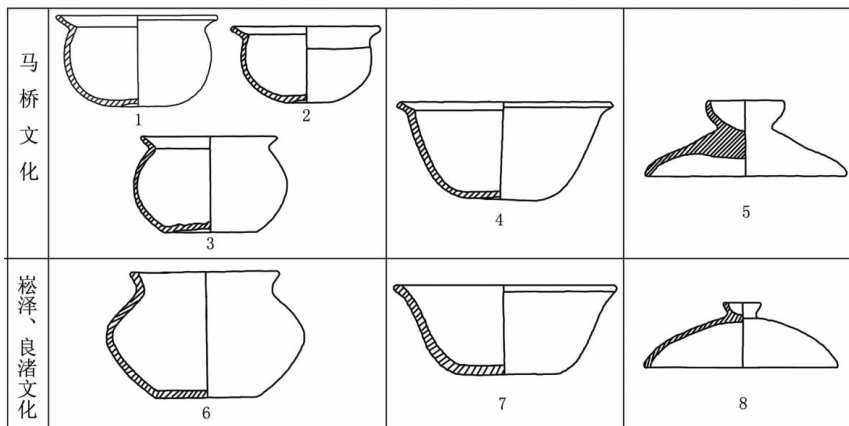
因此,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系可以初步区分为泥质红陶和红褐印纹陶两类。其中泥质红陶数量较少、造型相对单纯,大概与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有关;而带印纹的红褐陶则数量较大、造型丰富,许多形态特征在本地区文化传统中找不到相关因素,应与泥质红陶区别对待。本文即将这类带印纹的

红褐陶称为“泥质红褐印纹陶”,它们不仅丰富、凸显了马桥文化的独特风貌,更表现出与周边文化的相关性,在马桥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 二. 泥质红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密切相关。肩头弄类型是上世纪70年代在浙南闽北山区进行调查试掘时发现的一批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物。调查者将试掘出土的若干组器物群分为六个单元,分别代表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经夏商直至西周的前后发展的六个阶段。而其中年代大约在夏商之时的第一、二、三单元出土遗物与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被认为是肩头弄类型大量涌入太湖地区的表现。但事实上,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与肩头弄类型虽然在制法、纹饰、器形方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文化因素的传播方向上并不是肩头弄类型由南往北的单一流向,许多线索表明还有些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自创、且由北往南传播的。

首先从胎质上来看,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红褐色系,根据软硬度的不同,其色调从橘红、红褐、灰褐、到紫褐色不等,这其中,大部分印纹陶的色调均为红色,仅少数质地偏硬的陶器外表呈灰褐色。而肩头弄类型二、三单元的印纹陶器亦有软硬两种陶质,“火候低者呈灰黄色或淡黄色,质较软,反之则呈青灰色,质硬,扣之发金属声”。可见肩头弄类型的印纹硬陶色调为青灰色,与马桥文化以红褐色系的印纹硬陶色调不尽一致,



图一 马桥文化泥质红陶与崧泽、良渚陶器对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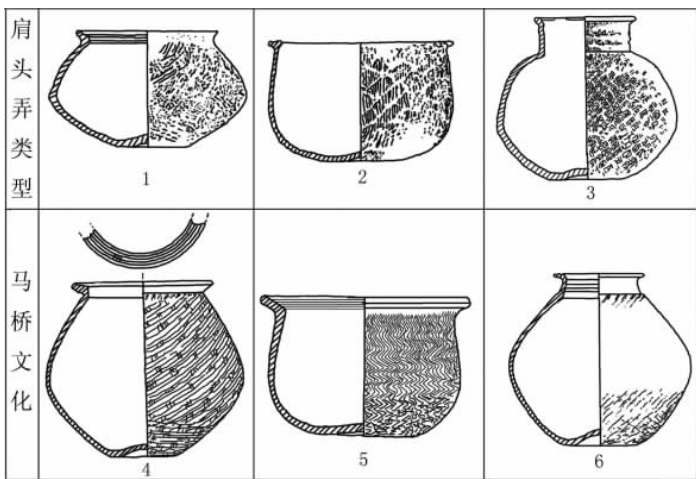
1. 小盆(马桥 T922③D:9) 2. 小盆(马桥 T1032③D:7) 3. 小罐(马桥 T724③B1:14) 4. 小盆(马桥 T1120③B:7) 5. 器盖(马桥 M102:2) 6. 罐(福泉山 M109:24) 7. 盆(崧泽 61T9:4) 8. 器盖(福泉山 M132:39)

后者的红褐色硬陶当具有其自身特色，似不应从肩头弄类型传来。

再从纹饰上来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的纹样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据发掘者统计，马桥文化在其年代早期第1段的地层中即出现有条格纹、条纹、叶脉纹、折线纹、方格纹、席纹、篮纹、云雷纹、菱格纹等纹样的红褐印纹陶片，其中条格纹和条纹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叶脉纹、席纹、折线纹、方格纹等。在马桥文化发展的4期段中，这几类纹样从早到晚始终存在，特别是云雷纹，还衍生出斜形、蝶形、菱形等变化多端的各种样式，成为马桥文化非常显著的一类纹样。另一方面，肩头弄类型的印纹样式相对来说数量和种类都少得多，其第一单元少见印纹陶、第二、三单元印纹陶数量才逐步增多；第一单元的印纹种类仅有条纹和交错条纹，第二单元出现方格纹，第三单元有席纹、方格纹和方格填线纹，直至第四单元才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云雷纹。可见，马桥文化的印纹陶不仅与肩头弄类型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其数量、纹样都比后者丰富得多，就云雷纹来说，马桥文化云雷纹出现早、数量大、纹样变化多样，肩头弄类型云雷纹则出现时间晚、数量少、样式单调。因此肩头弄类型的印纹纹样有可能是受到了马桥文化的影响。

除了纹饰之外，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与器形更是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关系密切的重要表现。一般认为，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大罐、小盆和鸭形壶在当地找不到承继的文化传统，却与分布在浙南闽北的肩头弄文化遗存有許多相似之处。然而仔细加以比较便会发现，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中仅有罐类器与肩头弄类型的同类器相似，其他器类则不然，且这些器类所代表文化因素的流向还可进一步讨论。

马桥文化的红褐印纹陶罐形态多样，依腹部和颈部特征可大体分为圆鼓腹、垂鼓腹、直腹和高领罐几种类别。这几类陶罐形态在肩头弄类型第二、三单元中都可找到与之特征相似或相近的同类罐形器。其中垂鼓腹、直腹和高领罐等形态与太湖地区传统因素差别较大、而与肩头弄类型相近，且在肩头弄类型中这几类罐形器都有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很有可能就是由肩头弄类型北上进入太湖地区而传播至马桥文化的(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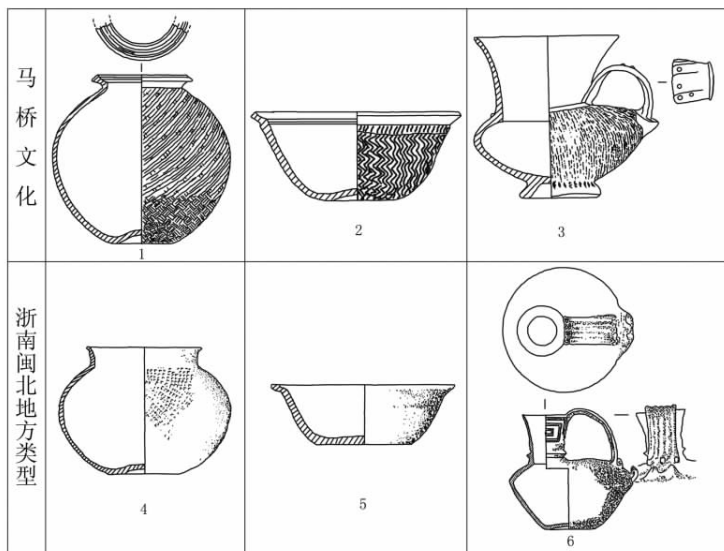
图二 肩头弄类型影响马桥文化的因素

1. 垂鼓腹罐(江肩〈三〉2:2) 2. 直腹罐(江肩〈一〉2:2) 3. 高领罐(江肩〈四〉2:2) 4. 垂鼓腹罐(马桥 T718③D:4) 5. 直腹罐(马桥 T620③F:4) 6. 高领罐(马桥 H230:1)

但是除此之外，更多的红褐印纹陶似乎显示了马桥文化向肩头弄类型传播的线索。马桥文化的圆鼓腹罐在上文提到与马桥文化泥质红陶罐类器的形态基本一致，有可能同样是接受了本地崧泽与良渚文化以来的地方传统、并经马桥文化传承后影响至肩头弄类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小盆的形态特征亦有多多样化的表现，如多斜折沿、斜弧腹或圆鼓腹、圜底或平凹底，而肩头弄类型仅见到一类斜弧腹的碗可与之相比，显然这类斜弧腹器形也是马桥文化对肩头弄类型施加影响的产物。另外一种器类是马桥文化非常有特色的鸭形壶。目前所发现马桥文化的鸭形壶型式多、数量大，年代贯穿从早到晚的4个期段。而太湖以南地区，浙南肩头弄类型的发表材料中尚未见到形态类同的鸭形壶，虽然再往南的福建北部黄土仑类型中发现了“式鬲形壶”与马桥鸭形壶类似，但两相对比二者的形态仍具较大差别，况且“式鬲形壶”不仅在黄土仑墓葬中仅发现3件、数量上远不及马桥鸭形壶，而且黄土仑类型处于相当于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年代上是晚于马桥文化的，其在传播方向上应该是受到马桥文化的影响。因此，马桥文化独具特色的鸭形壶当是自身发展创造出来的新器类，并作为马桥文化的典型代表因素而向外传播(图三)。

由此可见，红褐印纹陶的胎质、纹饰和器形虽表现出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的相似内涵，但这其中仅有一部分陶罐的形态说明马桥文化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如印纹纹饰和圆





图三 马桥文化影响浙南闽北地方类型的因素

1. 圆鼓腹罐(马桥 H140:1) 2. 小盆(马桥 H144:3) 3. 鸭形壶(马桥 T520③F:18) 4. 圆鼓腹罐(江肩<->2:4) 5. 平底碗(江肩<->1:1) 6. 式鬲形壶(黄土仑 M3:13)

鼓腹陶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器物的形态,均显示为马桥文化因素流向肩头弄类型的传播方向。因此,马桥文化与肩头弄类型中共有的泥质红褐印纹陶是两地区文化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产物,代表肩头弄类型因素传入太湖地区的那部分泥质红褐印纹陶不能成为马桥文化内涵中的主流。

### 三. 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几何印纹陶的关系

而如果在一个稍大的文化体系下来观察,我们就会对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直至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类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李伯谦先生就将南方印纹陶从江苏、安徽南部经江西、福建直至湖南、广东等地的遗存分为7区,每区又进一步划分期别,其中之一就有马桥文化所在的太湖地区<sup>⑩</sup>。事实上,马桥文化和肩头弄类型同样都是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与江南其他地区印纹陶遗存之间虽有差异,但其共性也很显著。

马桥文化种类繁多的几何纹样与其他地区印纹陶纹样几乎完全相同,从而使得马桥文化成为江南印纹陶文化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马桥文化常见的条格纹、叶脉纹、方格纹、折线纹、席纹等等,都是广见于江南各地的共同陶饰纹样。当然在某些富有地域色彩的样式上,马桥文化又与其他地区有所

区别。如宁镇地区最常见的梯格纹、赣鄱地区的圆圈纹以及闽台地区的贝齿纹,均不见于太湖地区,而马桥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各式各样的云雷纹,在其他地区的数量和样式也相对少得多。因此在几何纹饰方面,马桥文化在有少部分自身特色的情况下又与江南印纹陶文化区保持基本一致。

太湖地区印纹陶的质地和色调与其他地区相比亦为“大同之下存小异”。在太湖周围的宁镇北阴阳营<sup>⑫</sup>、赣鄱修水山背和清江筑卫城<sup>⑬</sup>、闽台昙石山和东张<sup>⑭</sup>等遗址的几何印纹陶中,几何纹样也同样施加在泥质红软陶器具上,但其印纹硬陶大多数都是青灰色,少见有红色系的印纹硬陶;与之相比,马桥文化的红褐印纹陶其硬度从软到硬大部分均为红色系,灰褐色硬陶仅占少数。因此马桥文化印纹陶仅在质硬的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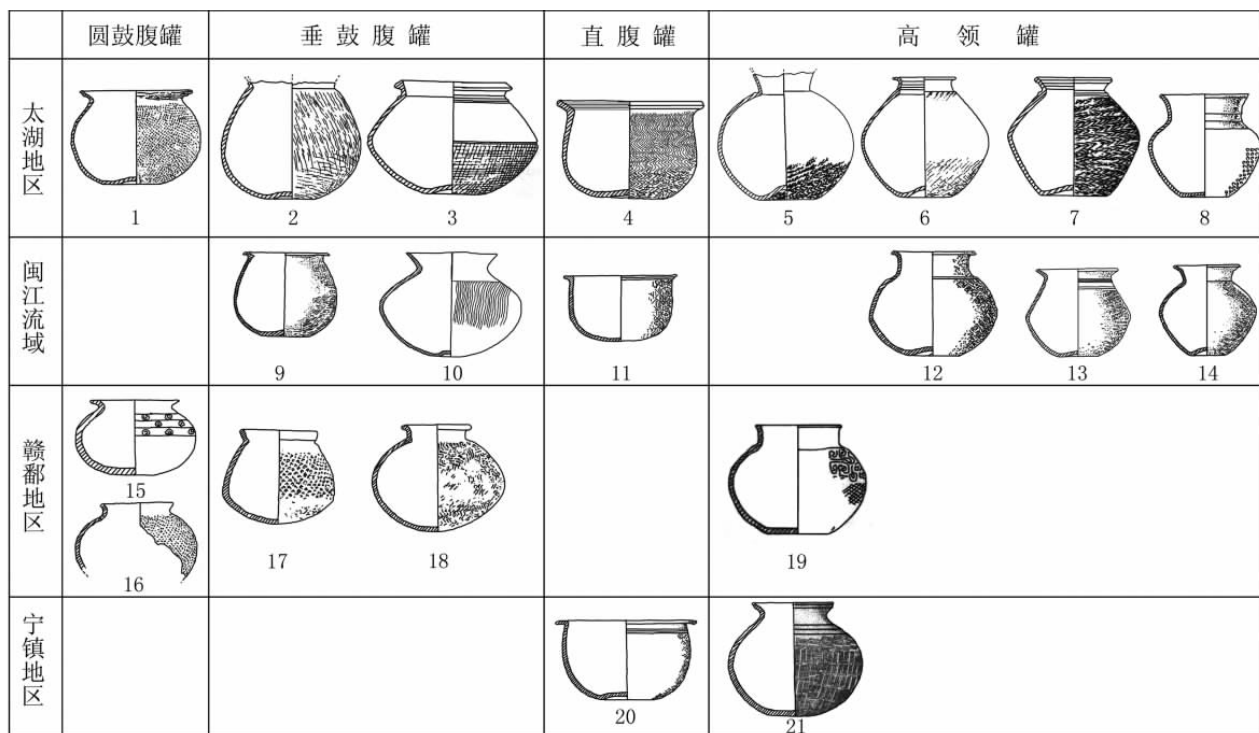
器色调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些微差别。

而器物组合和形态方面,尽管江南内部不同分区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拥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器物群,但就印纹陶器来说,各分区的几何印纹均不约而同地施加在罐、盆、瓮等盛储器表面,其中尤以罐类器为多,且这些罐类器大多具有敞口、折沿、鼓腹、圆底的特点,与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的罐、小盆在器类和形态上具有大体相似的特征(图四)。这更加显示了太湖几何印纹陶内涵与江南地区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下来认识,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事实上是联结夏商时期太湖地区与先秦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遗存的纽带。正是由于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存在,马桥文化才成为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后者在印纹陶的内涵方面保持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因此从江南早期的时空视野来看,马桥文化泥质红褐陶其实是这一特定范围、特定时段的共同地域特点。

### 四. 小结

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陶可以分为泥质红陶与红褐印纹陶两大类。其中以罐、小盆和鸭形壶为主要器类的红褐印纹陶,是马桥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内涵。细溯其渊源和流向,发现其中垂鼓腹、直腹等罐类器是由浙南闽北的肩头弄类型向北传入马桥文化的,而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器类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



图四 太湖地区与几何印纹陶文化各分区器形比较

1. 马桥(T : 8) 2. 马桥(J103 : 2) 3. 马桥(T825③B : 12) 4. 马桥(T620③F : 4) 5. 马桥(T522③E : 19) 6. 马桥(H230 : 1) 7. 马桥(T1120③D : 18) 8. 马桥(T : 4) 9. 光泽白主段(M1 : 2) 10. 福清东张(F1 : 17) 11. 光泽马岭(M1 : 9) 12. 光泽马岭(M1 : 1) 13. 光泽浔江(采4) 14. 光泽浔江(采1) 15. 清江筑卫城(T18① : 3) 16. 修水山背上漠源 17. 修水山背来源头 18. 修水跑马岭(F1T2③) 19. 清江筑卫城(T4①B : 7) 20. 北阴阳营(H55 : 38) 21. 北阴阳营(Y1 : 47)

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南闽北地区在夏商之时的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

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来看,马桥文化红褐印纹陶与先秦时江南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内涵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着“大同小异”的特点。因此对于红褐印纹陶,我们应将其认识为马桥文化作为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表征,是更大范围内江南各地某种程度的文化共性。而这种文化共性,便是居处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质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先秦时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一支的于越先民的考古学遗存。

(本文曾得到上海博物馆宋建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注释:

a.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b.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

社,2002年。

a.宋健:《马桥文化探源》,《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b.陆建方:《试论马桥——肩头弄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c.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73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118页,第八章第七节,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本表统计的对象为上世纪90年代马桥遗址发掘报告所发表的所有完整陶器。

a.陈尧成等:《上海马桥夏商陶器研究》,《陶瓷学报》1999年9月;b.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9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牟永抗等:《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文物出版社,1981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11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牟永抗等:《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文物出版社,1981年。

宋健:《马桥文化探源》,《东南文化》1988年第1期。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下转第26页)

注释:

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彭适凡、许智范:《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期)。后收入《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a.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b.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年代》,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c.李国梁:《屯溪土墩墓青铜器的研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文物研究》(第十一辑),黄山书社,1998年。

a.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b.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科)1981年第1期; c.张长寿:《论屯溪出土的青铜器》,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安金槐:《新干青铜器重大发现揭开江南商代考古新篇章》,《中国文物报》1990年第49期。

a.孙华:《新干大洋洲大墓年代简论》,《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b.(美)贝格立:《南方青铜器纹饰与新干大洋洲墓的时代》,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a.彭适凡等:《关于新干大洋洲商墓年代问题的探讨》,《文物》1991年第10期; b.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第10期。

邹衡:《有关新干出土青铜器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0年第47期。

⑪高西省:《论中原地区出土的几种异形青铜兵器——兼论新干大墓的年代》,《文博》1994年第1期;《初论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三件镞》,《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⑫、⑬(日)林巳奈夫:《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刍议》,《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

⑬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⑭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它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⑮李伯谦:《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文化滞后”理论》,原载《四川考古论文集》,1997年。后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⑯李学勤:《谈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化》,《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⑰何弩:《考古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⑱a.南京博物院:《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 b.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c.宫希成:《皖南地区土墩墓初步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⑳、㉑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㉒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㉓、㉔浙江安吉博物馆:《浙江安吉出土商代铜器》,《文物》1986年第2期。

㉕徐长青:《江西永修发现商代青铜铙》,《南方文物》2002年第1期。

㉖彭适凡:《新干古玉》,台湾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㉗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㉘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出土的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㉙a.马承源:《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研究》; b.马今洪:《试论浙江安吉三官乡土墩墓出土青铜器》,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8年。

㉚彭适凡:《岭南地区出土青铜甬钟简论》,《青铜文化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2009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第80页)

⑪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社科)1981年第1期。

⑫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⑬a.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山背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2年第7期; b.江西省博物馆等:

《清江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6期; c.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⑭a.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2期; b.福建博物院:《闽侯县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

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 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 3500 年至 4000 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 3200 年至 3900 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觶、觚等饮器,而鼎、甗、觶、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

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

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

《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一文,作者通过对马桥文化中数量最多且有独具特色内涵的泥质红褐印纹陶的器类、器型和印纹的深入分析、比较,认为马桥文化中那种红褐印纹陶的胎质、器形和纹饰虽表现出与肩头弄类型相似的内涵,但仅有一部分陶罐如垂腹罐、直腹罐类器接受了肩头弄类型北上的影响,其他更多的器类如圆鼓腹罐、斜弧腹小盆、鸭形壶等以及包括云雷纹在内的印纹纹样则发端于马桥文化并向南扩散至肩头弄类型。因此马桥文化泥质红褐印纹陶反映的是太湖地区与浙西南闽北地区在夏商时期地区间文化交流和影响关系。

该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还以广阔的时空视野,将马桥文化中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与江南其他各分区如宁镇、赣鄱地区和闽江流域等地印纹陶进行概略性比较后,认为在纹饰、胎质、器物组合上均存在“大同小异”特点,是南方几何印纹陶文化系统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共性是居住于江南广大地区先秦百越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马桥文化正是居于太湖地区百越民族的一支即于越民族的考古学遗存。

(彭适凡)